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文集

2007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

2007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2007/北京市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5073-2422-8

I. 马… II. 北… III.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
中国—文集 IV. 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2475 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2007

编 者/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孙 翊

封面设计/ 杨 群 欧阳显根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 100017

销售热线/ 63097018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方方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720×980mm 1/16 开 26 印张 375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2422-8 定价: 52.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编者的话

2006年6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与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办了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以研究中心承担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为主题，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历史进程、基本经验、重要意义及需要研究的问题等广泛展开研讨，产生了一批重要理论成果，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一年来，课题研究不断推进，已进入出成果的关键时期。为促进学术交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前进，2007年6月8日，研究中心与武汉大学在武汉联合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2007”，重点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又产生了一批颇具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这部文集在此基础上编辑而成。

在八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进程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凝聚着党和人民心血与智慧的历史经验，是弥足珍贵的理论财富，昭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重要指针。文集中多篇文章对这些经验进行了总结。课题组首席专家石仲泉撰写的“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一文，从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发展相结合这一视点出发，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阐述，为基本

经验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侯树栋撰写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一文，概括了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基本要素，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作了简约化的解读。陈先达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实践解读”一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实践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中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赵曜、郑德荣、鲁振祥、赵存生、周新城、包心鉴、余金成、秦宣、丁俊萍、汪信砚、梅荣政等专家的文章，或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或集中阐释某一具体经验，或科学解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或深入探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都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力作。

文集的策划和编辑工作，是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领导宋贵伦、张文启、辛国安等同志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刘福同、顾龙生等专家在论文的评选以及文集的编辑方面给予了大量指导和帮助；卢颖华、许星、林杨、赵海英、郎清平等同志在举办论坛和文集编辑过程中，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由于水平有限，编辑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编 者

2007 年 7 月

目 录

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石仲泉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实践解读·····	陈先达 (34)
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	侯树栋 (5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	包心鉴 (5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要素分析·····	秦 宣 (7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形成特点·····	梅荣政 (82)
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认识·····	赵存生 (88)
党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生命线·····	郑德荣 梁继超 (1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现代化 转变的三个基本问题·····	余金成 (119)
时代特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金龙 (127)
论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元成章 (138)
毛泽东对国情的把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鲁振祥 (146)
延伸与准备 1949—1978 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曲折进程与原因·····	郑 谦 (158)

立足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历史经验····· 程美东(17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丁俊萍 亢胜林(191)

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杰出贡献····· 王炳林 于 昆(199)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学习《江泽民文选》的一点体会····· 周新城(212)

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逻辑和思想

逻辑及其辩证关系····· 左亚文(223)

试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

开放观的创造性实践····· 武国友(233)

邓小平改革本质思想再思考····· 庄锡福(249)

关于邓小平发展高新技术及其

产业理论的研究····· 舒少泽(258)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徐崇温(271)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中国化研究

——共性与个性研究方法的运用····· 徐鸿武(282)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赵 曜(28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建构····· 李斌雄 王祝福(3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辛国安(316)

和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谐社会理论

与中国可持续改革的历史拐点	颜鹏飞(323)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思考	陈文通(334)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宋 俭(341)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汪信砚(35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侯且岸(36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问题	
意识与方法论自觉	郭建宁(382)
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重视	
批判西式教条主义	金 伟(390)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概观	
与经验反思	宇文利(401)

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石仲泉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尽管其思想的孕育、概念的提出和明确为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指南，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但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征途上，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践上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目前，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多少年来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中国人民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么它的基本经验是什么？这可以从不同的学科，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总结。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课题组，主要从党的理论和历史的发展相结合这个视点展开研究，对基本经验的归纳也兼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两个层面。在去年第一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研讨会上，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为题，汇报了课题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一些看法。这里，根据课题组两年多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讨论形成的共识，以及我个人的理解，与大家就这个问题共同研讨。

基本经验之一：真正地了解中国实际， 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

中华大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母体。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她的创始人就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但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正确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其认识和实践都并非径情直遂。大革命的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与那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中国实际国情缺乏深入的认识，以及与此相联系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正确地加以把握有密切关系。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特点、发展规律和前途、革命的领导力量、依靠和团结力量，以及革命的对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不能得到正确解决。

毛泽东既不是有“中国化”思路的第一人，也不是最早提出中国国情问题的领导人。^①但是，对于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有成效的，非毛泽东莫属。

^① 据近两年的研究资料称：在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思想界已认识到引进外国的学说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而“中国化”的概念早在1922年就在出版物中有了；至30年代前期，“中国化”一语已使用得相当广泛，这样那样的“中国化”说法屡见报端。关于认识中国国情，早在建党前的1920年底，恽代英致刘仁静信说：“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瞿秋白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参看《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发表张静如的《关于“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发表鲁振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

什么是中国国情？它既不仅仅指自然地理状况，也不仅仅是社会阶级关系，而乃涵盖自然和社会、现实和历史等诸多要素的总和。它包括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文化教育等方面，还有自然状况、人口构成、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历史发展等内容。认识这样复杂的国情，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住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显然，不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所能胜任的。毛泽东在了解中国国情、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方面优于其他领导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从青年时代始就注重了解社会状况，投身革命斗争后一直非常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一特质使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灿烂群星中很快脱颖而出。在他的学友一批批“出洋”时，他却选择留在国内，要先把自已的国家了解清楚，“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这不就是要了解中国国情吗？！在那时的莘莘学子中，有这样宏大抱负者是绝少的。

毛泽东在1921年7月参与建党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前的13年间，在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时候，几乎每年都抽时间，到工人、农民、或红军战士中进行调查，了解方方面面的社会实际。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他在中央苏区时期所做的以1930年5月寻乌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农村调查，使他获益匪浅。其调查对象除工农基本群众和苏维埃政权的干部外，还有学校教员、杂货铺主、商会会长、破产地主，以及前清秀才、钱粮师爷和县衙狱吏等各色人物；调查内容既包括县、乡、村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自然风貌、水陆交通、土特产品、货物流向、宗祠族权、家庭伦理、土地关系、剥削方式等，也涉及中央苏区的行政区划、政治制度、经济关系、人口成分、阶级状况、土地斗争、商业往来、税收制度、文化教育、世俗习尚、风土民情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调查使毛泽东通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页。

过了解南中国城镇乡村的社会历史面貌，以斑窥豹、由点及面，对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形成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

将近6年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实践基础，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井冈山斗争开创的“井冈山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但由于只有一年零三四个月，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不可能迸发。而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10年党遭受艰难困苦最长的一段时间，尽管党的指导思想犯了“左”的严重错误，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它锻炼和磨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革命实践，毛泽东的许多思想理论得到展开，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与此相联系，关于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等思想理论也初步形成。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已具雏形。他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和进行实际调查等，表明他不仅在实际运用上而且在理论指导上，初步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原则。这为明确提出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了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实践和理论的艰苦探索，再加上在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就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政治的和组织的保证。通过对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通过对抗日战争异常复杂的矛盾斗争和异常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进而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过去一部分同志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就在于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了解。而为了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才可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若要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的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毛泽东首先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作了理论概括。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的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个相反的道路，就是共产党要利用城市不能完全统制乡村，而广大的人力物力又在乡村；国家疆域大，有回旋余地这样一些有利条件，组织人民“进行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②随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

^①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591页。

也标志着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最终形成。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华民族在近代第一次全面打败外国侵略者作出巨大贡献，而且取得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创建了新中国。

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还要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社会主义建设既有胜利也有挫折，但无论胜利还是挫折，都有一个是否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头7年和上个世纪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认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因而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50年代后期连续3年的“大跃进”和10年“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都与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所处的社会主义历史方位有密切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拨乱反正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重新认识中国国情。邓小平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指出：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一是底子太薄，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问题。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考虑这两个重要特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党的十三大前后，邓小平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①

党的十三大阐发邓小平的思想，对我国国情进行全面分析，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深刻论述。10年之后，党的十五大在深入

^① 《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总结建国近半个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 20 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这个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任务。今年 2 月，温家宝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再次提出要深刻认识国情和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还论述了党在这个阶段的两大任务和两大改革，强调：这是我们党提出科学理论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丰富，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十三大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研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我们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① 十五大在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② 这样，基于对中国国情再认识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成为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石。一切从中国的真实国情出发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胜利向前的根本保证。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 页。

^②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 页、第 10 页。

基本经验之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 形成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首先是民族化。这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各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所谓民族化，内涵也很丰富。根据党走过的80多年历程来看，它至少应当包括：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上面讲的国情问题，换一个视角来看，就是民族化的现实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提出的。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首先就是不真正地研究中国国情（即民族的现实内容），照搬照抄外国经验。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是很难割裂的。因此，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兼顾这两个方面。这里着重讲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

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很注重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文化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观，因而也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作为文化形态，它又有对人类优秀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和共通性，即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连接相通。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能够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能息息相通。有五千年从未中断过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独领风骚千年以上，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①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有极大的包容性，善于接纳和吸收外来文化。尽管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者都有的博大的吸纳性，使它们能够融合相通、共存共荣，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一方吃掉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人既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担当中华文明传人的历史责任。毛泽东说得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用以帮助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文化。他从小就博览群书，“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等经典古籍都用心攻读过。他在中学写的论商鞅变法习作，被老师嘉奖为“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①如果说中国历史文化可分为主流经典文化和非主流草根文化，那么，他不仅熟悉上述主流经典文化，而且对非主流的草根文化也有浓厚兴趣。被称为“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等名著中的人物故事，他能如数家珍——道来。他酷爱读书，包括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都没有间断过。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去解读和运用中国历史文化为革命服务。他读过的上述两方面的书籍，或者说喜欢的两种文化，都对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发生了重要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他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攻打长沙未果，随即转移“上山”，结交绿林，落脚井冈，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这固然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分析革命情势，审时度势的结果，但这样被“逼上梁山”，“沦为草寇”——实际上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不言而喻，这是历史上的草根文化的深厚影响。

如果说毛泽东在造反打仗时，草根文化对他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影响十分明显，那么到陕北后，中国古代经典文化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突出。他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